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論文集

第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

第二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

第二集

编 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纸 1/25 印张：18 1/25 插页：2 字数：360,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051

定价：（九）1.60 元

目 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

-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 荣麟 (2)
——論《苦花集》及其作者的思想
真实与真理 王西彦 (20)
感想与感受 杜鹏程 (33)
——略談“写真实”
論現實主义問題討論中的修正主义觀点 袁文昭 (40)
論馮雪峰在艺术构思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吳調公 (56)

一九五八年二月

- 高举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 張立云 (80)
論創作自由 陈瘦竹 (89)

一九五八年三月

- 文艺战线上的一場大辯論 周揚 (102)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以群 (135)
——兼評何直、周勃及陈涌等的修正主义論点
評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觀点 李希凡 (170)
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塑造正面形象 梁楠 (180)
——斥吳文蕙：《強調塑造正面形象有必要嗎？》

一九五八年四月

- 《艺术即政治》批判 罗 蕤 (200)
秦兆阳的前言和后语 常 硕 (222)
評关于典型問題的修正主义观点 賈文昭 (232)
——批判錢谷融、鮑昌、王愚的論点
批判馮雪峰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陈鳴树 宁宗彝 (248)

一九五八年五月

- 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林默涵 (262)
为争取思想大跃进、創作大跃进而奋斗! 陆学斌 (280)

一九五八年六月

- 談陈浦的“真实”論 以 群 (294)
透明的还是污浊的? 刘白羽 (306)
——評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艺綱領
論阿Q的典型性格 唐 弼 (315)
——批判馮雪峰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論的文艺观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問題 陶 然 廬湘 (335)
——批判何直、周勃的修正主义观点
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观 胡 采 (356)
——玉愚宣揚了什么样的“新颖”理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

- 关于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 李关元 (384)
——駁唐擎、杜黎均

一九五八年九月

- 秦兆阳的破产 刘白羽 (400)
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 解駁珍 克 地 (415)
——驳《海闊凭魚跃》

一九五八年十月

- 駁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論 姚文元 (424)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問題 任光椿 (437)
——兼驳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

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論文目录索引(1958,1—12) (449)

- 編輯后記 (455)

一九五八年一月

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

——論《苔花集》及其作者的思想

荃 麟

这两年来，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相当普遍的影响，黄秋耘同志的《苔花集》及以后所写的《刺在哪里？》《犬儒的刺》等文章，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一例。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为了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对于这些思想进行一次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秋耘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和他长期以来那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分不开的。要批判他的文艺观点，首先要分析一下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十年以前，我和秋耘在香港一起工作，我们曾经对他进行过一次思想批判。那时秋耘的言论中即流露出浓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很欣赏爱伦堡在《巴黎的陷落》的一句話：“十磅怜悯与一磅信心。”这本来是一句带批判性质的話，指某些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与其說是由于对革命的信心，无宁說是由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怜悯心。秋耘欣赏这句话，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

本来，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思想，在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确实曾经对我们产生过刺激革命的作用。但是当我们已经参加到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的时候，这种思想就成为一种前进的障碍，成为个人的包袱。而当革命更

向前发展，它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就愈来愈无法调和。不是摔掉这包袱，就是被这包袱所压倒。我们这个时代中，知识分子身上两种阶级意识的矛盾，最突出的就表现在这一点上。周扬同志在作家协会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一个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

秋耘曾经受罗曼罗兰前期的思想影响很深，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影响。罗兰在这部小说中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大勇主义精神，在秋耘看来是一种最崇高的人生态度。这种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成为秋耘世界观中最主要的东西。据他自己说，他还受了庄子、孟子、屈原、鲁迅等人的影响，但显然他是从上述观点上去接受这些人的思想的。例如屈原，在他看来就是那种大勇主义的化身，而鲁迅也是一个那样的人道主义和大勇主义者。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读者中间确实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克利斯朵夫那种凭借个人的信仰和精神力量，用个人奋斗的方式去追求人生真理和反抗现实的精神，引起了许多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把克利斯朵夫当作一种理想的人物。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曾经竭力推崇这部作品，作为宣传他们“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根据。显然，这样来认识罗曼罗兰这个人或《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罗曼罗兰确实曾经是一个资产阶级杰出的个人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但是到了晚年，他终于彻底地批判了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成为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一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十五年来，他们（按：指知识分子）中间最优秀的分子，终于不能离开个人主义的盲巷。他们做到了‘与世隔绝’，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对这同一个良心说话。而事实上，我们的优点也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能够在一起，各自闹独立性，大家都无能为力。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本人，即是最好的例子。”罗曼罗兰号召知识分子应当从自己这只船上跨到“那只赤色的船上去”。而在他《与过去告

別》一文中，更堅決地指出，知識分子要走向新生的道路，必須“斬斷身后的橋梁”，即是說，必須和資產階級意識千絲萬縷的關係，永遠一刀兩斷。這是多麼徹底，率直的自我批判。在二十世紀初，世界上最杰出的幾個作家，如羅曼羅蘭、魯迅、A·托爾斯泰等，都經歷過這種從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的艱苦路程。他們的偉大正在這裡。我們要學習他們的也是這種精神。但是有些人却總是從相反的方向去接受他們的思想，把他們曾經自己批判過的東西，當作最聖潔的東西，而對他們後來所肯定的東西則不感興趣。在接受魯迅的遺產上也有類似的情形。這難道是對待這些偉大作家的正確態度麼？就以羅曼羅蘭的前期思想，如反映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來說，固然是種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义思想，但是如果不是抽掉這些思想的具體內容和時代背景，那末，我們可以明白，羅蘭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者殘暴的掠奪和屠殺，他的大勇主義主要是反對當時歐洲知識分子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盲從與附和。在十月革命以前，這種思想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一面，雖然他那種個人奮鬥的途徑證明是毫無結果。而正因為這樣，當他在十月革命以後，看到了世界工人階級的力量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就堅決拋棄了舊的觀點，接受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這恰好為舊知識分子指出一條光輝的道路。而我們有些讀者，包括秋耘在內，却排除這些時代的條件，抽象地接受了克利斯朵夫的人生觀念和人生态度，作為我們這新社會中的人生觀念和人生态度。這顯然不是對於這部作品的忠實態度。

為了幫助秋耘克服他這種思想，我曾經勸秋耘翻譯羅曼羅蘭的後期作品《搏斗》——長篇小說《迷人的靈魂》中的一卷。在這部小說中，羅蘭以唯物主義觀點猛烈地批判了克利斯朵夫式的個人主义思想。秋耘認真地譯了這本書。在一九五一年他所寫的一本介紹羅曼羅蘭的小冊子中，也敘述了羅蘭的這種思想變化過程。但即從這本小冊子中，也看到一種痕迹。秋耘雖然肯定羅蘭思想發展的道路，可是對於羅蘭那

自我批判精神却說得很不够。他似乎把罗兰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过程，看作一种單純的思想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阶级思想与感情的变化。这反映在他自己的思想上，就是对于旧包袱的依恋不舍。他不是象罗曼罗兰那样坚决地“与过去告别”，坚决地“斬断身后的桥梁”，而终于背着这个包袱，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

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思想的时候，秋耘曾經写了一本《論胡风的五把刀子》的小册子。他指出胡风的所謂“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抽掉阶级内容的虚伪的概念。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到两年，他的第二本小册子《苦花集》恰恰掉过头来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否定了前一本書中的观点。他同样是抽掉了阶级内容，来强调所謂“艺术良心”“童心”“人道主义”“大勇主义”等等，認為这些是艺术創造的基本条件。他引用庄子的話說：“哀莫大于心死”。在他看来，目前創作上的危机主要就在这里。这实际是回到他自己所批判过的胡风的理論上去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秋耘分析他自己思想状况說，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对于斯大林錯誤的批判，給予他以极猛烈的震动，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的状态，这是使他思想右倾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我以为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他內在意識方面。这就是他那种“十磅怜憫与一磅信心”的人生态度在作怪。这种猛烈的震动，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內在意識中对于社会主义信心的动摇。近两年来，許多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右倾状况，我以为基本原因都是由于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一九五五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被消灭，这是我国社会生活一个巨大的胜利，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必然反应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上，产生了他們內在意識中资产阶级思想与工人阶级思想强烈的冲突。在这个生活剧烈变化的日子里，知識分子身上个人主义的弱点，便无可掩饰地暴露出来了。秋耘自己說，他在实际生活中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和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还

有相当距离。他看到今天“好些人有眼泪，并非因为笑得太过份，而是因为困难和不愉快的遭遇在折磨人。”他看到“今天在我們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飢餓，还有失业，还有傳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現象。”因此他要求“作为一个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艺术家，是不應該在现实生活面前，在人民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缄默的。”①为什么在这样巨大胜利和巨大变动的日子里，秋耘不是以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心去对待我們的新生活，而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克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某些困难和缺点，而却用一种悲天憫人的态度来大声呼吁“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呢？这不正是反映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不足，而另一方面，他原来的那种資產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就在这种矛盾中抬起头来么？在《苦花集》以及后来一些文章中，很明显表現出他这种思想情况。《苦花集》的第一篇《启示》，是紀念魯迅的一篇短文。作者說明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他說：

二十多年来，这样的信念在我底心中与日俱增。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缺少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缺少对生活的高度热情，缺少“己飢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思想，缺少“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就沒有崇高的人格，也沒有真正的艺术，剩下来的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和空虚的偶象。……

應該說，我之所以認識到这一些真理，主要得力于魯迅先生的启示。

可以看出，秋耘所謂“真理”、所謂“真正的艺术”的本质，不是别的，即是“己飢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也即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所追求的，而后来又为罗曼罗兰自己所批判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

对于人民命运的密切关心和对于生活的高度热情，都是从群众斗

① 秋耘：《不要在人民疾苦前面閉上眼睛》，《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爭實踐中所產生的一種階級感情；是行動的結果，並不是決定於什麼藝術良心之類。目前某些知識分子中間，存在着那種冷淡、麻木、政治熱情衰退的現象正是由於他們脫離生活，脫離群眾的結果，而主要的並不是由於他們本身主觀上缺少了一些什麼。這裡，我們不妨仍來引用羅曼羅蘭的一段話。他說：“信仰，文化等等東西，只有重新在有組織的勞動的堅強基礎上建立起來。這種組織要求很大的力量，象希臘神話中的海格涅斯的力量那樣，而個人是不可能成為海格涅斯，只有同人民結合起來，才有真正的力量。”①這才是唯物主義地說明人的主觀精神作用的問題，也說明了藝術力量的問題。象秋耘那種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解釋，不僅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只有引導人們更加脫離群眾，從個人內心世界中去追求一種空虛的精神力量。

而用這樣一種觀點來理解魯迅，尤其不正確。魯迅的偉大主要在於他腳踏實地，站在唯物主義的堅固基礎上，為人民大眾和無產階級事業進行了畢生的戰鬥。魯迅的真理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真理，所以毛澤東同志稱他為共產主義的聖人。魯迅也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但他是個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並不是那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雖然魯迅早期，也確實受過歐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影響。例如“死守真理，以拒庸愚”，即是魯迅在一九〇七年所寫的《摩羅詩力說》中介紹易卜生思想的一句話。魯迅當時甚至还受尼采的影響，主張“重個人，輕物质”②。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前，還是新學與舊學相爭的時代，即使這種個人主义思想，顯然是具有其進步的作用，何況那個時候魯迅在革命主義與改良主義兩條道路鬥爭中的立場，是十分堅決和明確的。魯迅也是一貫反對中庸主義的。魯迅的反中庸思想，在初期固然沒有脫離個人主義的窠臼，但愈到後來，便愈帶着鮮明的階級色彩。關於這一點，

① 羅曼羅蘭：《搏斗》。

② 魯迅：《文化偏至論》。

瞿秋白同志說得很好。他認為魯迅的反中庸思想就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市儈……表面上往往會對所謂弱者‘表同情’，事實上他們有意無意的總是維持着剝削制度。市儈，這是一種狹隘的，淺薄的東西，它們的頭腦（如果可以說這是頭腦的話），被千百年來的現成習慣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圈子里自動機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學校、中西‘人道主義’的影響，把市儈的腦筋造成一種簡單的機器，碰見什麼新奇的，‘過激’的事情，就會象留聲機似的‘阿呀呀’的叫起來。”❶可見魯迅所拒的“庸愚”，正是指資產階級用傳統觀念反對新事物的那種反動思想，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所謂“中西人道主義”的思想。這和秋耘所說的個人主義的大勇主義是並無共同之處的。

魯迅的著名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充分地反映出後期魯迅的階級精神和敵我觀念：對敵對階級的堅決反抗，對勞動人民新生代的全心全意服務。而秋耘却同樣引用這些詩句來作為他那種人道主義和大勇主義的注腳。在他看來，“橫眉冷對千夫指”正是指“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精神，而“俯首甘為孺子牛”則是指“己飢己溺、民胞物與”的人道主義精神。這顯然是種曲解。例如秋耘在另一篇文章中❷把現在的所謂讀者的“輿論的压力”——即讀者對於某些批評的不恰當的責難——也說成是“千夫所指”的情況，這更是錯誤的看法了。所以這與其說是秋耘從魯迅的啟示中所認識的“真理”，無寧說是從他自己的世界觀基礎上去誤解了魯迅的精神。

人們也許會問：這種“己飢己溺、民胞物與”和“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精神，即使是由時代的觀念，但對於我們，尤其對那些在關心人民命運的人們，又有什么不好呢？難道社會主義社會就不需要人道主義和大勇主義精神嗎？而且我們不是常說要從古典作品中去接受它們的

❶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❷ 《苦花集》：《創作和批評的障礙》。

人道主义精神嗎？那末为什么又要反对呢？

問題不在于抽象的名詞，而在于它的实质。人道主义或大勇主义都有它一定阶级的內容。例如“己飢己溺”，原是孟子的話。孔子、孟子都以仁为其学說的中心，也可以說是封建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可是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栖栖皇皇，終于不能实行他們的理想，而孔子的学說却反而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阶级統治人民的思想工具。耶穌是被称为救世主的。他的博愛主义，也何尝不是人道主义精神，而他自己甚至为了这种理想，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生命。这难道不是出于真誠的追求？但是耶穌也同样不能解救人民的痛苦，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却成为资产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包含着解放个性，爭取人权的意义，不是沒有它的积极性。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不但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任务，而相反地由于它的剥削更加残酷，使人类生活更陷于非人道的境地。无论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就表现在这种概念的真正意义和其社会制度的不相容，而他們那些人道主义者总是竭力企图調和这种矛盾。高尔基說：“我們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所謂‘人道主义’——也就是仁爱主义文化的虛伪性，完完全全，无可爭論的，极无耻地暴露出来了。社会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人的生活行动所造成的。这种生活行动的力量，也就在暴露一些現象的反人道的意义，那是人道主义派和所謂‘法律’，花言巧語所隐蔽着的。在我們这个时代，只有白痴和拿笔杆的騙子才会說，仁爱和自私自利——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和‘灵魂’——可以并存。”①从这里，也可以理解，我們所謂要从古典作品中去接受的人道主义精神，无宁說是由于这些作品揭露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种种反人道的現象，从而刺激了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自觉。这和那种“己飢己溺”悲天憫人的人道主义是毫不相合的。

① 高尔基：《关于真实的教育》。

當我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时代，如果还是用資產阶级那种人道主义思想来作为我們对待生活的态度，那就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性。我們記得十月革命以后，欧洲一些所謂“人道主义者”就用这样那样借口来攻击和誹謗过苏联，直到不久以前，这些先生們还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在抗議所謂“匈牙利事件”。甚至最近居然还有人要为苏联人造卫星上的小狗萊伊卡的命运而提抗議，这自然已經堕落到无聊与无耻的极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曾經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象法斯特之流，也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后，自以为站在保卫“人道主义”和“法制观念”的立場而退出了革命的行列。这难道不足以說明这种資產阶级虛伪的人道主义觀念对于革命的危害性嗎？

前几年，报刊上批判过梁漱溟的思想。梁漱溟是研究东方哲学的。他把儒家的“仁”和釋家的“悲”結合起来，作为东方哲学的精华。这正是那种“悲天憫人”的虛伪的仁爱主义的代表。而梁漱溟就是根据他这种觀点，反对过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后又用什么“工农生活相差九天九地”的謬論来挑撥工农联盟的关系。这类例子在我們生活中是并不少見的。

我們再举秋耘自己的一个例子。秋耘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議上的檢討发言中說，他曾經看到在寒风凜冽中衣服不够的人，就不禁想起了前代詩人的“滿街參天英雄樹，萬井啼寒未有衣”的詩句。这是他那种人道主义意識很自然的暴露，然而不正好說明这种意識的反現實的性质嗎？这句詩是暴露封建社会貧富悬殊的反人道現象，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同样的意思。本来是句好詩。可是秋耘把它和我們現在生活中的某些匱乏的現象聯想起来，这却变成极端的荒謬了。把旧时代的人道主义觀念，应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就可能在实际行动中产生极其謬誤的反現實的傾向。

真正的人道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之下，凭借其自己的斗争和劳动，推翻了

几千年来剥削社会制度，創造了我国历史上所未有的劳动偉迹，征服了沙漠与洪水，战胜了灾害与瘟疫，使我們国家在短短八年之内，从极端貧困落后状态走向社会主义的繁荣与富强，而在十五年之内，我們要赶上英国的工业水平，三十年之内要赶上美国的水平。这难道不是旧时代中所梦想不到的最大人道主义嗎？为了社会主义建設累积資金，我們今天还需要节衣縮食，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也不是为了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能够更快的提高嗎？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我們也还有各种各样困难和落后現象，如秋耘所說，还有飢饉灾荒，官僚主义等等，這是现实发展中难免的情况。馬克思主义者以正視現實的严肃态度去和这些現象作斗争。党所提出的农业发展綱要和各种建設的长期规划，党所领导的全民整风运动，正是依靠群众力量和这些困难、落后現象作斗争。这才是最偉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創造的现实基础上，建立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确信上。它不需要那种“已飢已溺、民胞物与”和“死守眞理、以拒庸愚”的虛伪的人道主义和大勇主义。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种卑賤的麻煩的工作，决不如詩人所想象那样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設，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所以对革命抱着浪漫蒂克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推行，便容易失望。”① 秋耘的那种悲天憫人思想，实际上是反映了这种对革命实际的不了解，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缺乏信心所产生的失望和怀疑。他不是从客觀实际出发，而只是从个人的主觀感受出发，去認識生活。因而使他陷入于唯心主义的泥沼，使他看不到大是大非，而却为历史前进中的某些落后和困难現象感到栖栖皇皇，忧心如焚。这种离开大是大非而斤斤計較于小是小非的微温态度，不正是秋耘自己所深恶痛絕的大儒主义的一种形态嗎？这种唯心主义和个人

①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